

教育时论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需要全方位的儿童视角

马亮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城市建设要以儿童为中心。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22个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35年,预计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超过50%,100个左右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

过去城市在规划、决策、建设、运行和管理等方面缺少儿童视角,致使很多设施、政策和服务对儿童不够友好,甚至导致儿童的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比如,一些公共场所缺少儿童厕位,导致家长尴尬,甚至对儿童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再如,父母和监护人工作繁忙,使儿童得不到应有的陪伴和照料。

联合国早在1996年就提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使城市回归到儿童优先的定位,既有利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也有助于同国际接轨。《意见》从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了32条具体意见,对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明确了努力方向。

儿童所看到的城市是一个立体的整体,各个维度都需要以儿童的视角和立场来加以全方位的审视和优化。从儿童视角1米高度看城市,城市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造,才能适应儿童的发展需要。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涉及各个方面,需要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统筹协调。《意见》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儿童工作一盘棋理念,使全社会形成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合力。

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方面,要加强政策的协同性和联动性,使相关政策能够及时更新并全面推行。比如,由于营养提高等原因,儿童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过去按照身高来确定的公共交通、旅游景区、公共场所等的免费或半价政策,都需要随之予以调整。各个城市和单位不能标准不一,导致儿童及家长无所适从,难以享受应有的优惠。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虽然涉及很多部门,但是需要全盘统筹和高位协调。每个部门不能将儿童友好城市人为切割开来,使建设本身失去了整体性和系统性,导致各个部门的政策看似出发点很好,但是却难以有效衔接。换句话说,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要在城市治理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贯彻儿童优先的理念,使儿童走到哪里和做什么都能真实感受到优先照顾的良好体验。政府部门在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要有担当精神和主动作为,真正想到前面和做到实处,使儿童的安全和健康得到全面呵护。

儿童如何参与城市规划,让他们能够表

达自己的偏好和需求,使他们的观点能够融入到城市规划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成年人和家长们往往认为自己知道儿童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并代表他们作出一系列的决策。但是,儿童实际上是否需要和喜欢这些成年人安排的活动,有待考量。如何让儿童的回归儿童,让儿童成为决策的主角,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主人,是特别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在很多时候,成年人很难摆脱既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并认为童言童语不值一提。但是,儿童往往更加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对城市规划和治理提出更加令人耳目一新和眼前一亮的金点子。考虑到儿童对游戏的喜爱,可以将一些公共政策进行游戏化的设计,使儿童更有参与意愿。这样一来,或可在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同时,使儿童可以贡献更多的创意,让城市更加对儿童友好。

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方面,要抓住当前儿童在安全、健康、学习、成长等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对这些关键事件的破解,来带动全盘工作的推进。儿童的安全是儿童友好城市的底线,为此要通过设施改造和政策改革,让儿童可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安全出行。比如,切实执行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政策,加强摩托车和电单车的安全管理,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儿童交通事故伤亡。

儿童的快乐同学业压力和学习负担关系密切,今年以来推行的双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儿童的课程压力,使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父母如果没有时间陪伴,那么儿童很难全面快乐地成长。如何加强劳动权益保障,确保父母在法定节假日应休尽休,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儿童,就成为各地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然,儿童友好不意味着其他年龄段的市民受到排斥,而是有可能求得平衡和融合。对儿童友好的场所、设施、政策和服务,对其他年龄段的市民也应该是可亲可近的。比如,建设更多城市公园,让儿童可以亲近自然,也会为成年人带来身心放松的公共场所。

《意见》指出要推进城市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加强儿童友好街区建设。适儿化改造可以和适老化改造齐抓共管,让老年人和儿童可以在同一个公共空间相处和交流,既有利于排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也有助于儿童得到照料和陪伴。一些城市将养老院和幼儿园相邻而建,就达到了二者兼得的目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微言

共享自习拓展学习新思路

杨文越

没有博取眼球的技术,没有写字声、键盘敲击声之外的声音,屏幕里只有一张桌子、一盏台灯、一个正在学习的人。如此单调的网络直播,居然能火。时下,打开各类视频网站,在直播区便可以发现自习直播。

在自习直播之前,则是共享自习室的遍地开花。到共享自习室消费学习的人并不只有学生,还有许多已经工作了年轻人,他们大多在为考研、考公或考证而来。购买安静的、能够让人专注的环境以及良好的学习氛围,是他们的核心诉求。有阳光房、有声室、小黑屋、单人房等不同类型的自习室可供选择,也满足了自习者的不同需求。

自习直播刚刚出现在视频网站和直播平台上时,显然是古怪而不合群的。但疫情催生了自习直播的火爆:疫情给共享自习室带来了冲击,却让自习直播走向流行。直播的形式打破了物理空间上的限制。在疫情期间,打开自习直播,和屏幕里的人以及直播间里的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是在无法出家门的情况下,拥有氛围浓厚的学习场景最佳选择之一。

自习直播出圈的背后,是年轻人在交互平台上相互鼓励、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做自习直播的人希望用一种被人关注的方式来养成自律的习惯,在镜头的监督下,克服自己不够专注、容易偷懒的毛病。而观看自习直播的人则希望从他人身上找到坚持的动力。大家通过网络空间,寻找志同道合的学友,通过打通与他人的联结来确认自身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角色,激励自己努力,共享求知的时光。

日常生活中网络、社交和各种琐事都在消耗我们的注意力,大脑经常处于怠速状态,难以集中精力保持专注,因此一个能让人更加高效学习的空间,确实是部分人群的刚需。自习直播侧重于自习氛围的营造和集体自习的陪伴感,共享自习室则多提供了物理上安静稳定的自习场所,二者都通过营造集体自习的环境,打造了一个能提高人们学习效率的空间。二者的实质,都是提供共享自习的氛围。

共享自习的流行是学习型社会、共享经济发展和互联网经济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无数热爱学习的年轻人和社会连接、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的重要途径。通过共享自习,只要你愿意,在外不难找到一间共享自习室,在家可以打开自习直播,自律不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共享自习,一群自律的人对生活和学习的热爱、积极进取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也把共同成长进步、实现理想的可能带给了更多的人。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0级本科生)

让家长监督晚自习模糊了责任边界

樊成

据媒体报道,广西桂林一所学校要求家长轮流到学校监督学生晚自习,时间为每天19点20分至21点20分。家长如果没空或者不愿意监督晚自习,可以出钱请人,一晚100元,由家委会安排人值班,报酬给志愿者。当地教育局回应称,将针对这一情况要求学校整改。

家长代替老师监督晚自习,本就是一种越俎代庖的乱象。如果缺席还要出钱请人,其实已涉及乱收费问题了。不得不说不,涉事学校的管理者在这一事件上,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还丢掉了专业精神和教育常识。

无论是日常的课程,还是早自习、晚自习,这些都是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学校和教师的职责所在。让家长来轮班监督晚自习,甚至搞出了付费代劳的名堂,本质上是把本该属于学校和老师的责任,转移给了家长。另外,这种做法还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家长们真的能够胜任晚自习监督员这一岗位吗?

最好的管理,就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教师是一个有着专业门槛的行业,并不是随便一个家长就可以代替的。学生留在学校里上晚自习,原因之一就是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向值班的老师请教吗?试问,有多少家长真正具备相应的专业辅导能力?

所谓监督晚自习,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看孩子。就算抛开专业的辅导能力不谈,如果有学生在自习时突发疾病或遇到其他紧急情况,处理不及时不到位,最后责任算谁的?这恐怕也是问题。

近年来,家长在教育领域扮演着越来越丰富的角色,家校之间的合作愈发密切。这在整体上是好事,有利于为教育事业凝聚更多的资源和人力,也有利于家校之间形成和谐互助的良好关系。但是也要看到,一些过于紧密的家校合作,逾越了家校之间本该有的边界,混淆了权责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例如,今年教师节前夕,深圳一中中学初二级家委会,发动所有班级为教师购买礼品,后被叫停。这种行为,尽管是家长主动的,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和教育伦理。

家委会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进家校互动、促进学生成长。一些家长直接干预教学活动,甚至插手学校硬件设备的引进、教师福利的发放等,迷失了家委会的定位。另外,那些过分主动的家长,其实无形中绑架了其他家长。双减背景下,学生的负担和家长的负担,乃至教师的负担,是一脉相承的。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要考虑为家长和教师减负。

学校、教师、家长要分别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好。如果职责不清,就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焦点时评

善用革命文物激活思政教育大课堂

康欣

革命文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时空的历史价值,承载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历程中的共同记忆,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载体,能够开启过去与当下的知识链接、情感共鸣、观念共享。将思政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革命场馆,采用情境式教学,是近一年来思政政治教学改革的新创举。

近日由教育部、国家文物局指导,山东大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的全国革命文物与新时代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工作融合发展论坛在济南召开,这是贯彻《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政治工作的意见》,将革命文物资源创造性转化为高校思政政治教育教学资源,切实提升高校思政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举措。这一论坛有利于用革命文物讲好党的故事,展现革命先贤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艰苦历程,传承革命英雄的红色精神。在此基础上,如何深入系统地讲革命文物、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思政政治教育大课堂,还需要在内容体系、方法创新、教学情境、理论探索、评价机制上进一步补充完善。

加强革命文物资源的系统性梳理,对接思政政治教育的教材体系。思政政治教育的教材强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与主线,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革命文物的遗存并

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需要人为整理和利用。长期以来,革命文物的甄别认定、标志和统计建档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它并不与教材体系直接对接,通常只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以高校与革命场馆协同联动的视角,对革命文物进行系统性梳理至少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按照教材历史分期确定革命文物对应的时间序列,这有助于在选用革命文物时,按照历史发展进程依次选择,以避免碎片化和跳跃式的讲述。二是按照革命文物的横向地域分布整理,既有助于在教学中既展现出历史遗迹的地理图谱,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减少实践教学成本。三是按照教材体系中的重要性排序,突出与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相关的革命文物在教材中的地位。

发挥革命文物的教学资源禀赋,推进思政政治教育的教学创新。首先,鉴于革命文物的保护需要特殊的环境条件做支撑,不能将文物直接用作普通教具进入思政课堂,但思政课堂却可以搬进革命场馆,以情境教学模拟还原历史环境,通过改善教学环境增强课程的感染力。其次,革命文物的图片与影像可以纳入教材或教辅资料,增加思政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素材供给,充实教学资源库与样本量,从而提升思政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最后,革命文物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便

于优化教学设计,将课堂从说教式讲授中解放出来,增强课程的吸引力。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让学生体验社会实践对历史进程的创造意义。同时用数字高清技术观察革命文物,帮助师生更加精准地捕捉历史细节,重新发现革命文物的育人价值。

传承革命文物的精神内涵,激发思政政治教学的精神共鸣。革命文物虽历经沧桑,却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革命文物的展示与呈现,可以唤醒文物本身的在场记忆,便于参观者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体会革命文物的精神意蕴。在思政政治教育中以静态革命文物与景观场景再现,辅以动态的影视、音乐、解说呼应,便于大学生在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与历史人物的革命精神形成知、情、意三个层次的共振与共鸣,从而实现铭记和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教育目的。

挖掘革命文物的研究价值,探索思政政治教育的理论互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革命文物的发现、研究与利用,可以提供历史的物质佐证,帮助建立史实关联,丰富历史研究的视角。而思政政治课要帮助学生树立四个自信,推动党史教育入脑入心,首先要借助客观史实的强大说服力。以革命文物的新

发现与深入研究为契机,对学生接受的历史知识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筛选,可以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史实的任意解读、肢解扭曲,让学生明晰唯物史观的方法意义。因此,可以借助革命文物讲堂,形成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文物保护、鉴别实践相融相促,进而帮助拓展思政政治课的理论深度。

建立革命场馆的实践基地,优化思政政治课实践教学的评价机制。推进革命文物资源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需要搭建合作平台。高校通过与革命场馆建立实践基地,就双方合作的形式、内容时间、开放场次进行协调,是纪念馆里的思政课有序开展的前提。馆校协同合作首先是人员知识结构的互补,可以通过集体备课、专业知识培训等方式共享教育资源。其次,通过研学、参与讲解、文物修复观摩等形式,开展大学生主题实践活动,扩大革命场馆的社会影响力。最后,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实践教学的效果。在高校预留实践课时、学分,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革命文物保护、革命精神宣讲的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作者系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策论·“关注课后服务”系列评论之四

多方协作为课后服务提质

王名扬

课后服务是一项顺民意、暖人心的民生工程,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增强课后服务服务能力、有效减轻家长负担的重要举措。由义务教育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是对课内与课外时空的有效衔接,是课后育人与延时托管的有效融合,可解决我国全面整顿校外培训市场后暴露出来的新问题。

自2017年教育部积极推进课后服务工作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与此同时,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课后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课后服务吸引力弱、教师工作负担加重等问题也暴露出来。为解决相关问题,促进课后服务各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各参与主体明确谁来提供服务、为谁提供服务、由谁负担服务经费等责任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各尽其责、协同合作。

学校是责任主体,应找准办学特色,打造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学校作为课后服务的提供者,其主要职责在于开发有特色的课后服务课程体系。这套课程体系需突破学科、教室、班级壁垒,以校本课程和兴趣社团为基础,以系统性、多元性、实践性、趣味性为导向。这就需要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挖

掘并凝练其内在特色,结合本校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制校本课程,切实增强课后服务项目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课程是承载主体,应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提供个性化教学。课程是课后服务的基石,课程的内容和质量决定着课后服务的水平和效果,应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化发展的原则。课后服务项目的课程设置需满足三个功能:一是救助功能,为那些在课堂集中教学过程中消化不了的学生提供个别辅导,提供查漏补缺为目标的知识补差服务,实现教育过程公平;二是选择功能,为那些在正常教学中吃不饱的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拓展其学习空间,满足求知欲和个性化发展需求;三是公平功能,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防止课后服务变相为集体教学,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

教师是实施主体,应锤炼专业能力,提高教育教学创造性。师资是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的关键力量,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参与积极性直接影响着课后服务的质量。就教师自身而言,应在全面关注学生学习兴趣、创造力、课堂效率的基础上,

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就学校而言,应给予教师更多关爱,减轻正式教师的非教学类负担;引进社会力量扩充师资来源,适当将体育艺术科技工作者、大学生志愿者、退休教师等群体纳入课后服务活动,弥补校内师资不足,实现校内外联动;建立制度化的激励机制,保障教师获得课后服务报酬的合法权益,不让为家长分忧的惠民工程建立在教师的无偿劳动之上。只有师资得到了保障,教师的付出得到了肯定和合理的待遇补助,才能充分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确保课后服务水平的提升。

家长是参与主体,应自愿选择且支付合理费用,促进家校共建共治共享。一方面,课后服务不具有义务教育属性,而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学校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需要充分了解学生、家长的内在需求,使家长、学生全面了解有关安排,积极引导有需要的学生自愿选择参加课后服务,与家长协商具体支付比例。另一方面,家长不应把孩子的教育完全推责于学校,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互相协调、互为补充,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教育的最大作用。

政府是监管主体,应加强对课后服务的

全方位监督,完善课后服务制度环境。政府对课后服务的监管应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课程监管,对于学校所引进的社会机构需明确准入标准,应由政府出台指导意见或者机构白名单供学校选用,加强对课程质量的监管,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二是价格监管,除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外,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学校,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性的原则,由省级教育部门和有关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价格标准。三是经费保障监管,应由政府提供补贴、中小学酌情收费,保障教师获取适当服务报酬。四是安全监管,压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制定、优化课后服务安全管理办法,谨防食物中毒、火灾、杜绝体罚、性侵害等现象。

课后服务是一项具有准基本公共服务性质的系统工程,其质量的提升需要以学校特色课后服务课程体系为根本,以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教师的专业能力为抓手,以家长的参与和政府的监管为保障。唯有通过多方共同努力、相互协作,方能促进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最终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教育公平、缓解教育焦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